

巴能强
著

中国经典智慧

《易经》《论语》《韩非子》《孙子兵法》《道德经》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经典智慧

巴能强
著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典智慧/巴能强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564-0212-0

I.中…

II.巴…

III.中华文化—通俗读物

IV.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8618 号

中国经典智慧 ZHONG GUO JING DIAN ZHI HUI

出品人 方 平

责任编辑 刘书慧 刘 皖

封面设计 牛 红

责任校对 刘慧芳

责任督印 张遇春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印 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货场路粮库院内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4-0212-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 027-83637493 进行调换)

目 录

导论 中国文化经典的创造性智慧 1

第一章 《易经》：自强求变的进取精神 11

第一节 《易经》的核心：生生之为易 11

《易经》的由来/《易经》的构成/“易”的演绎

第二节 《易经》求变的背景 16

周人的困惑/旧邦惟新

第三节 把握乾坤之变的大势 20

元、亨、利、贞/潜龙勿用/终日乾乾

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第四节 求变的信念与品格 33

君子以经纶/无平不陂 无往不复/君子有终/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君子以立不易方/自昭明德/以同而异/致命遂志

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革故鼎新

第二章 《论语》：仁义诚信的修身品格 52

第一节 《论语》的修身之道 52

孔子的遭遇/《论语》的由来/修身之道/援仁入礼

第二节 学以修身 59

学而时习之/过则勿惮改/慎终追远/礼之用和为贵

君子好学/贫而乐道 富而好礼

第三节 修身的准则 69

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君子不器/见义不为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成事不说 遂事不谏 既往不咎/义利之辨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修己安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杀身成仁/过犹不及/立言立德立功

第三章 法家：权术治世中的规则意识 90

第一节 法家的治世理想：富国强兵 90

法家的渊源/威权 吏治 变法/秦国变法为什么成功/历史不可假设

第二节 权术治世的经典智慧 100

君用术臣守法/君临天下之威势/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
明君无为于上 群臣竦惧乎下/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善用术者明权
功当其事 事当其言

第三节 以法治世的经典论述 117

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使法择人不自举 使法量功不自度/一民之轨莫如法/道私者乱
道法者治/言无二贵 法不两适/法莫如一而固/因时变法 因世治法

第四章 兵家：因变制胜的竞争策略 134

第一节 谋略为本的智慧体系 135

兵家的由来/流派与思想/以谋略为本/因变制胜

第二节 因变制胜的战略谋划 141

天时地利人和/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
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胜可知不可为/以正合 以奇胜/激水漂石

第三节 因变制胜的战术应用 161

各个击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围师必阙 穷寇勿迫

围地则谋 死地则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第五章 《道德经》：因循自然的处世智慧 173

第一节 因循自然的核心：“无为” 173

老子的身世/“道”的突破/“无为”的由来/“无为”的境界

第二节 “道”：自然无为的智慧之源 181

功成弗居/无为而治/天地不仁/上善若水/太上不知有之

绝圣弃智 见素抱朴/曲则全 枉则直/为者败之 执者失之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将欲取之 必固与之

第三节 “德”：自然无为的智慧运用 203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大音稀声 大象无形/大成若缺 大巧若拙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善用人者为之下

人之道 损不足以奉有余/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导 论

中国文化经典的创造性智慧

公元前 500 年，人类文明进入思想文化大发展的高峰期，所有不同类型文明的源发性思想差不多都诞生于这个时期。爱琴海边的希腊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和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同时开启了对宇宙、人类、社会的思考。希腊文明对自然的探索，印度文明对人与神关系的思考，中华文明对人与人关系的反思，几乎同时呈现，形成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

放眼人类历史长河，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轴心期”文明，都带给人们丰富的精神资源、根深蒂固的价值指向和无尽的生存智慧。在人类复杂多变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中，这些精神资源砺沙成珠、集腋成裘，孕育发展成为各自文化中的经典智慧。这些智慧或凝聚于经典中，或以生活话语的形态散见于神话故事或流传于生活俚语中……无论何种形态的集中呈现，都是“轴心期”文明价值的再次觉醒。

中国文化经典《易经》《论语》《韩非子》《孙子兵法》《道德经》等，差不多都诞生在这个时期，它们开启了中国文化反躬自问的思考方向，对人的行为操守、道德观与社会生存规则的反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中华文化与中国智慧创造性发展的一个巅峰，展示了中国先贤对农耕文明社会生存状态的开创性本源性思考。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重新解读和认识中国文化经典，是中国价值与中国文化传承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经典及其价值，必须结合“轴心期”文明的时代背景，探索形成和影响中国人思想、行为的集体文化意识。解读中国经典，必须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辨析中国经典的时代特色、思想脉络，把握中国人修身处世的理想信念、心理及思维方式，才能够找准中国文化发展方向，认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所处位置及历史担当，既不盲从先贤们的智慧片言，也不要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中悲观彷徨，真正走上中国文化自强自觉之路。

文化经典和智慧是渗透到一个民族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精神给养，是修炼健全人格、塑造时代新人的土壤。处于文化复兴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应当从中国文化经典中感受哪些精神文化滋养，汲取哪些智慧呢？

一、《易经》：自强求变的进取精神

中国文化经典中凸显人的积极主动与自觉理性精神的，首推《易经》。《易经》把天道与人事、自然与社会、天道运行规则与社会运行律令条陈罗列，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从更久远的时间和更宏大的空间角度来思考社会与人事，追求人事与天命的协调一致，孕育形成了顺天应人、自强求变的进取精神，包括：

“元亨利贞”的节奏意识；

“君子终日乾乾”“履霜坚冰至”的忧患意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器宇轩昂、果敢刚毅、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的配合意识和濡

子牛品格；

“君子同而异”，识大体，存不同，坚守差异与个性的独立意识；

“君子自昭明德”的一身正气；

面对困难“致命遂志”的坚韧；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革故鼎新”的变革创新意识；

.....

《易经》作为中国古代先民卜筮未来吉凶、辅助决策的经典，确立了“天人相通”“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基础上的预知决策模式。天、地、人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关系，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敬天悯人”的文化尊崇，不只渗透在中国人宗教意义上的本体生存意识中，而且经由文化传承，其天、地、人之互通转化的关系，已由先民原初的混沌感悟上升为后人理性的认知，成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理性思考法则。

中国人讲究“变”，追求“变”，善“变”。从中国人奉为文化圭臬的“天人合一”的视角看，人属于天地的体系中的一环，需要顺应天地五行的变化适时而动。这并不是说人就是消极被动的，恰恰相反，如何掌握时机，抓住天地运行规律促成变化非常关键。“变”还是“不变”？何时“变”？如何“变”？在天、地、人的体系中，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有主动性也有被动性。从客体转化为主体，由被动转化为主动，就是“变”的规律所要求的。处于优势的时候，希望“不变”；处于劣势的时候希望“变”，这是人之常情。《易经》把这种变化与天、地运行法则结合起来，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将人的自在状态提升到自为状态，为人的积极有为、自我管理提供了根据。从“潜龙勿用”“终日乾乾”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人的各种状态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在困难的时候不失信心，谋大业注重配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体现的正是中国人乐不忘忧，奋发砥砺，自强不息的忧患意识和突破困局、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二、《论语》：仁义诚信的修身品格

中国文化传统赋予每一个人“天命”，也就是“先天之性”。“天命”按自己的方式展示运行的逻辑就是天道，把握了天命的人就是圣人。圣人可以遵天道而行，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道”为天地万物所共同遵守，不能按天道而行的人就必须自我修炼或接受教化，这样才能达到天道与人道的和谐。因此，人要德配天地，妙赞化育，才可以与天道的精神相契。

圣人是时代的楷模，其德足以服众，才可以安邦，圣人的出世既有先天的造化又有后天的修炼，是两者的和谐统一。圣人的条件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君子则不同，可以由后天修养教化而成，是个人心性修炼的结果。只要付出努力、完善品德，人人都可以享有君子的荣耀。因此“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人们总是用德行与才干来判断一个人，德才兼备是圣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有才无德是小人。与小人的无德相比，君子和圣人都追求道德的完善，故而人们常常把圣人君子归类在一起，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修身的重视。

《论语》关于君子的人格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孔子把“恭、宽、信、敏、惠”五个方面作为仁的内涵，仁就是要恭敬自重、宽宏大度、诚实守信、勤劳敏捷、慈心施予。具体说来，君子不重则不威，因而君子必须庄敬自重，才有威严，不会遭受侮辱；君子忠厚宽容、有大气度、有包容心，才会得到大家的拥戴；君子诚信无欺，才会得到任用；君子勤劳敏捷，办事效率高，贡献就大；君子施恩惠于人，才乐于用人。

怎样才能修得君子的人格呢？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和”既不是“同”，也不是“不同”，而是“大同”与“小异”的综合。中国文化重视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不只在宏观的宇宙，也在个人内在世界。如果只有宏观的“大一统”而没有微观个体的“和

谐”，还只是“和”而没有“不同”。中国文化既有从宇宙自然的宏观视角审视社会人事关系的和谐统一要求，也有从个人出发反观天地万物的“不同”思维。所谓推己及人、仁民爱物的整体观就是如此。“和”是天下通行的规则，是整体上的和谐一致、物我相通的要求，“不同”则是差异、对立和偏反。中国文化把这种差异、对立和偏反视为整体和谐的一部分，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宽容、平和、兼收并蓄、博大恢宏的品格，正是和谐辩证运动的要求。中国文化所表达的自然与人和合，人与万物和合的追求，都在“和”的追求中融汇。“和而不同”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大自然阴阳平衡，相辅相成，不偏向任一极端。“和而不同”强调天地、自然、人文的对立调和、互动互补的原则，使天地万物正常地发展。因而，“和而不同”既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又是人际关系的法则。不执着于极端，在大小、刚柔、强弱、上下、徐疾、动静之间相互渗透，就是圣人君子兼顾个体和整体、内在和外在的和谐智慧。

“和而不同”的修身方法表现在学习中，就是“学而时习之”，既要善于学习又要加以运用。“君子好学”说的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能过多追求美味的饮食和舒适的居处，要时常检视自己，向有德的君子学习，才算得上是“好学”。“君子不器”则要求君子不能固着于某一个方面的才艺，而应该通于艺、游于艺。同时，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不走弯路，犯了过错就要勇于纠正，做到“过则勿惮改”。

“和而不同”的修身方法表现在人际关系上，要求“修己安人”。即是说，只有提高自己的修养，才能使周围的人安乐，而要让天下的百姓安乐，更要修炼自己。孔子认为后者是近乎圣人之仁，尧舜也未必能做到。而“推己及人”则是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来推想别人的感受，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般君子实践“仁”的方法。只要平等对待他人，理解他人，宽待他人，就是一个仁人志士了。

三、法家：权术治世中的规则意识

春秋战国王权式微，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宁。在不同势力竞争较量的过程中，秦王朝崛起，法家思想逐渐占据优势，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传播。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首推韩非子，他融汇并发展了老子、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强调“法”“术”“势”相结合，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法家主张以“法”为核心，将“法”“术”“势”即制度、技巧和权威的作用巧妙结合，用相对稳定的法条律令管理人事，强化法令的权威和普遍适用。与儒家的“人治”不同，法家的“法治”否定除君主之外所有人的特权，大大增加了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即便君主权力的使用，也应符合既定的法令和规则，而不能依凭主观判断和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依靠规则和制度，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好管理，相反，如果抛开了规则和制度，即便优秀的人才，也无法保证管理的成效。

法律是靠人来遵守和执行的，如果人们对法没有敬畏，法律就失去了效力。法律必须配合强力灵活的推行手段才有约束力，因此，法的应用还需要借助“术”和“势”。

“术”指的是君主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其意义在于使“法”的人格化身——君主不被蒙蔽和控制。法家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权力基础上的信任，为了权势，父子可以相残，夫妻可以反目。君王要想不被蒙蔽，就要将自己的好恶隐藏起来不轻易显示，因为臣下一旦知道君主的愿望和意见，就会借机讨好君主以致操纵君主。“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就是君主应对臣下之术。君主只要无为而治，不暴露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群臣就会在下面诚惶诚恐地做事。君主治国理政，对臣下不仅要防范，还要利用，两者必须拿捏得当。用臣下之时示之以信任，控制臣下之时施加重手，“用人不疑”与“天威难测”交替使用。

“势”是君主的权势。法家主张君主主要独掌军政大权。法家在人性自利和人性本恶的价值设定基础上，以轻赏重罚的手段治理国家。韩非子极力推崇建立在赏罚基础上的严刑峻法，认为“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所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以赏罚二柄为“法治”的最重要手段，以君主的威势作为制度的保障，通过一套驾驭臣下、防范僭越、保障君主威势的措施，法家确立了“以法治国”的理念和操作系统。法家的“法律”与威权并用的思想流传深远，统治者用严刑峻法把臣民置于违法或者有罪的状态之下，然后以宽赦的方式取得臣民的服从和忠诚，在法律之外，为威权留下操作空间，贯彻的正是法家的思想。

法家所谓的“法治”，与现代意义的法治不同。法家虽然强调“法”的重要性，但法家之“法”，最终来自于君主，其局限在于只是对臣子和百姓的控制。法家在人性本恶基础上设计的重惩轻赏规则，倾向于惩恶而不是扬善，可以暂时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不能焕发人们向善求美的理想。如果奖赏与惩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奖赏是对人的主动性的认可，而惩罚是对人的主动性的剥夺。所以，基于法家思想的制度设计提倡牺牲个性的整体观和共同体的价值，而非鼓励个人自由、自我追求的进取意识，最终必然导致君主集权和百姓无权、强国与弱民并存的局面。

比较人治色彩浓厚的儒家思想，法家权术治世的规则智慧在一定范围内凸显了法律的权威和规则的效力，能在更广的范围推行社会公平与正义，帮助统治者积权聚势，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君王梦”，因而，法家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

四、兵家：因变制胜的竞争策略

中国古代兵家的诸多论著虽然针对军事，但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战略、策略设计，对人际交往、谋事筹划和经营管理都有重大参考价值。

兵家讲究运筹谋划，强调精细计算，主张在竞争态势中审时度势，对外界环境和组织内部有清醒认识，据此作出正确判断和决定。兵家提出“因变制胜”，强调内外环境之“变”对决策的影响，要求人们对各种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并积极创造“变”的因素，时时处处占据主动，不受制于对手。《孙子兵法》系统完整地反映了兵家的思想和智慧。

兵家因变制胜的竞争策略首先表现为重视谋划和算计。“上兵伐谋”就是讲行动成败的结果取决于之前谋划的质量。“未战而庙算胜”要求充分估计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能胜则战；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能完全战胜敌人的情况下，还要预想战争的后果。其次，因变制胜的竞争策略表现为重视时机。“激水漂石”是说激流之水，迅猛快急，其奔流之势产生的冲击力能带走石头。说明在短时间内的迅速出击，可以形成强大的势能，使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最后，因变制胜的竞争策略还表现为策略的适时改变和调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把用兵比作水的运动，水因地形改变流向，用兵也要根据敌情制定取胜的策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指出将领在外可以相机行事，不必事先请示或等待君主的命令。

兵家对春秋战国之际动荡纷争的战事总结，既从全局性战略高度分析战争，主张居安思危、慎重应对，“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又从战略实施的策略上分析，“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要求掌握对敌的主动，根据情势采取不同的策略，“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虚实变化，奇正结合，看准机会，务求取胜。在竞争成为常态的现代社会，兵家的因变制胜竞争智慧，对于人们慎重选择对手和竞争战略，以及如何在竞争中取得主动并赢得竞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五、老子：因循自然的处世智慧

道家思考天、地、人的关系，把它们归结于本原性、规律性的“道”，主张天人合一，强调阴阳互补，注重中和平衡，尊重义利关系，从“道”的运行规律揭示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阐释治国、立身、修业之“道”，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老子所著《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认为“道”是世间万物存在的根基和归属。“道”是万物的始基，它既是“天地之始”，又是“万物之母”“万物之宗”，“道”创生万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为“道”生长万物而不加以干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又是客观自然规律，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道”是天地之间的自然法则，体现“有”与“无”统一的“众妙之门”。“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辩证特点，如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向对立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在天地人世之间，又有相反的表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因此，为人处世的根本是要尊重规律，不去破坏天地运行法则；从事物对立面转化的角度看，人又不能无所作为。如何遵循天人之道顺势而为，就成为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境界。具体来说，道家因循自然的处世智慧可以概括为：

一是不任意妄为。“无为”就是要顺应万物本源之“道”，遵循天道规律，不胡作非为，不任意妄为。统治者不无端生事，老百姓就富足安康；统治者没有私心杂念，老百姓就纯洁朴实。二是上不为而下有为。统治者“无为”，老百姓自然就自我化育、行为端正。道家所谓“无为”境界，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要求统治者不任意妄为，不干预百姓的自然

生活，正如老子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三是守柔居弱。道家认为，守柔居弱是“道”的特性，统治者应遵循“道”的法则并引以为心性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原则。只有居下守贱、示弱用柔，才可以安然立身于世，才能让处下位的人能有所用，正所谓“善用人者，为之下”。四是无私无欲。道家的“无私”指不偏私，对任何事物都一律同等看待。统治者要实现治国安民的理想，就必须摒弃常人追求利益与欲望的私心，而怀成就事业抱负的理想，功成业就也不据为己有，做到“功成弗居”，抛弃那些聪明智巧，抛弃所谓的仁义理念，“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让百姓恢复慈孝的天性、自然的本性，社会自然得到安宁。

中国文化历经五千年的繁衍流变，形成了既重视个人功业又兼顾整体大局的家国文化传统，养成了阳变阴合、动静有序、刚柔相济、生生不息的和谐辩证思维方式，义利兼顾的伦理价值观以及“导德齐礼”的政治路径和治理方法。《易经》赞天地之化育，尽人能以宏大天性，从根源上奠定中国文化生生不息、自强求变的传统，从战略上为中国文化提供了顺应自然、开拓创新、穷通变易的智慧；《论语》仁义诚信品格与尚“中”求“和”的方法，表达了中国文化自然与人文和合，人与万物和合的人格追求，让人们回到内在自律、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道德精神状态；立足于现实人性利益与好恶追求，重视法律适用的普遍性、一致性，强化规则的权威与应用，法家提供了权术治世的规则智慧；兵家审时度势、因变制胜的策略，为个性竞争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制胜之道；道家讲究顺应天地运行规则，不任意妄为，居下守贱，示弱用柔，无私无欲，提供了因循自然的处世智慧。这些文化经典分别从求变精神、人格修养、规则意识、策略手段、处世方法等方面展示了以人为本，尊重规律的特性，这一特性是中华文明中的人文精神不同于“轴心期”其他文明的耀眼闪光处，呈现“轴心期”中国文化为了人的人文理想、发展人的人文气质、包容人的人文胸怀的智慧之源。

第一章

易经 自强求变的进取精神

《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中华文化原典”，由伏羲氏、周文王（姬昌）和孔子演绎概括而成。《易经》既是卜筮用书，也是一部哲学经典。《易经》的“易”含有简易、变易和不易三种意思，是说宇宙万物的三种存在状态，即顺乎自然的“简易”、时时变化的“变易”以及恒常不变的“不易”三种状态。处于何种状态，将会如何变化，都是“易”的内容。《易经》强调变革、变易与进取。《易经·系辞》讲“生生之为易”，又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指出变易、进取是摆脱困境、通达长久的法则。《易经》主张的更新、日新、革新，是万物根本性、本源性的规定，对诸子百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的刚健有为、兵家的辩证思维、法家的富国强兵，道家的回归自然、刚柔并用、无为而治，都与《易经》的变革精神一脉相承。

第一节 《易经》的核心：生生之为易

《易经》的由来/《易经》的构成/“易”的演绎

《易经》的由来

《易经》也叫《周易》，传说中夏代（前 2033—前 1562）《连山》易学（又称神农易学）和殷代（前 1562—前 1066）《归藏》易学（又称尧舜易学）已失传，我们见到的《易经》是西周（前 1066—前 771）早期，一批作者以《连山》易学和《归藏》易学为蓝本，继承发展而写作完成的，所以《易经》又称《周易》，又称《包羲易学》。